



Research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张之沧 张嵩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张之沧 张高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张之沧,张嵩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413-8

I. ①西… II. ①张…②张…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698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XIFANG MAKESI ZHUYI ZHEXUE YANJIU

张之沧 张 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50 千字

ISBN 978-7-01-015413-8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	1
第一章 物质观和时空观	2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	27
二、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	33
三、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	45
四、后现代地理学和空间论的方法特点	56
第二章 自然观和生态观	6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	67
二、人和自然	81
三、生态与人道	88
第三章 认识论	103
一、关于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	103
二、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的具体应用	110
三、认识与兴趣	112
四、身体认知的符号化机制	126
第四章 实践论	140
一、关于马克思的实践方法论	140
二、卢卡奇的实践历史观	150
三、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	153

四、科西克的能动实践观	158
五、南斯拉夫实践派	163
第五章 真理论	168
一、科学与真理	168
二、信仰与真理	185
三、检验真理标准的现代诠释	197
第六章 辩证法	206
一、总体性辩证法	206
二、启蒙辩证法	218
三、否定的辩证法	225
四、具体的辩证法	236
第七章 伦理思想	252
一、创建合人性的社会	253
二、日常生活伦理研究	268
三、交往伦理和包容理性	277
四、后现代伦理和个性解放	281
第八章 道德哲学	288
一、霍克海默的反道德主义	289
二、萨特的存在主义道德观	300
三、利奥塔的后现代多元道德观	312
四、福柯的性道德虚无主义	323
第九章 政治哲学	336
一、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剥削理论	336
二、波普尔的逐步的社会工程	355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	360
四、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	373

第十章 美学理论.....	383
一、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	384
二、福柯的生命之美	395
三、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主义	408
四、身体与美之深层关系解析	414
中英文参考书目	423
术语和主体索引	434
人名索引	449
后 记	457

导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产生并长期流行于欧洲和美洲诸多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显然应该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由于一些约定俗成的原因，本作涉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指葛兰西、卢卡奇及之后在世界范围有很大影响力的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理论和观点。这其中，既包括人道主义、实践主义、激进主义、批判主义、心理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实证论、分析学派以及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也包括否定主义、历史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理念和理论。这些学派和理论实质上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身包含的辩证法决定它必然是一个不断否定、分化、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髓得到真正传承。证明它不是可以到处搬用的僵死教条，而是指导人类行动的指南。今天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纷纷登上哲学舞台，也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依然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和青睐。不过也正是他们的正大光明、诚信无私的批判和修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地变革和完善。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出自这样一种探索和评判立场，本作比较充分地介绍和肯定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立场。

首先，就继承马克思实践观的经验派马克思主义而论。在他们看来，在德国，那种把哲学当作远离社会现实的玄学，并不是马克思向往的。为此，在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缺陷之后，确认那只是绝对的抽象和纯粹的方法论概念，而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才是每个人最崇高的责任。正是基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一些经验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坚信：以往

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使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的异化现象，使全人类获得自由，才是真正人生的理想。也正是基于马克思创立的这种革命的实践理论，才使得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种主张“无产阶级科学比经验科学优越的流行观点，非常危险地接近于这样一个边缘，即反对经验研究的精神和态度，幻想无产阶级科学在工业、医疗和空间技术中创造出非凡的成就”。结果这些非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在牺牲工人利益，实现一个工人的乌托邦。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打碎了这种乌托邦幻想，导致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改弦更张，同时吸收了两种不同的科学：一是热心推行一种经验性的科学研究和发展计划；二是采纳了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解释经验特性的一般概念。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旨在综合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科学，并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经验的社会科学家的运动”^②。

在这种观点看来，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规律体现在实际的经验条件中，而经验主义又只看重被经验的现实，它往往是严密的和非神秘化的，因此这两者的结合将科学地确立无产阶级的反叛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必然性。当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优于经验论，然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这个先验品格。马克思关于物质、历史和革命的理论产生于他所进行的广博的经验研究，而且只有当这些理论解释了不断增加的经验事实时，它才可能是正确的。“那种先于经验的根据、‘本身’就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严肃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且对于无知者来说也是危险的。”^③

其实，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对黑格尔的抽象主义进行了批判，继而又把异化看成一个以经验为基础而且可以从经验上证实的非人化的过程。直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真正的知识”和“积极的科学”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关于“自我意识的空洞的说教”，从而将自己的历史唯物论建立在“以纯经验的方式”加以证实的真正的事实根据之上。特别是他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关系网都置于历史的前景之中，描写了它的经验起源，预示了它的否定性发展方向和最终将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代替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②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页。

③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页。

目标。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基于经验事实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是天真和幼稚地颠倒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真正关系。正是从这个经验观点出发,马克思从未提出某个绝对的先验原则,也未把革命看作一个超验的物质总体和观念总体。因此必须把马克思理论的效用与他当时没有预见到的许多新的变化相比较。从统计学上讲,他作了正确的长远性预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之再次成为阶级分析和预言的决定性工具的人,是新实证主义者、意大利共产党德拉·沃尔佩及学生 L. 科莱蒂。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曲解,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修辞学去取代正确的政策。源自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假定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辩证法的连续性。前者强调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后者强调黑格尔的总体性和异化理论。其实,两者并无直接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先验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科学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否弃思维与存在的唯心主义统一、强调两者的异质性为特征的。为此,沃尔佩等人主张要对社会生产具体过程进行分析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历史发展进行具体研究;主张重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缜密探讨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从中引申出正确理论,将潜在的阶级斗争改造成积极的阶级斗争。由此,他们又提出“无矛盾原理”,认为只有遵循无矛盾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并通过科学与行动的统一展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上,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认为,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简单颠倒。马克思不仅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也改造了他的辩证法的内部结构。比如黑格尔的“总体性”是一种表现的总体性;而马克思的“总体性”则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其中每一部分都相互作用。为此阿尔都塞修正了经济决定论,认为它在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并不是始终处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而是互为主导,互相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于英美国国家形成的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确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日益盛行的人本主义以及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站在科学主义角度,利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新的论证阐释。它受益于逻辑分析哲学,其开辟者是英国逻辑分析家柯亨,代表人物有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默、范帕里斯、普舍沃斯基、E. 赖特等。他们公开表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较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自己的原则和特征。

他们认为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仅限于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经验现象和模糊不清的自然语言或形而上学语言，而要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抽象的原则，把理论命题程式化、逻辑化、规范化、模式化和简单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微观论据，从具体问题和概念入手，为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奠定基础。他们主张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本质性、革命性，又要看到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受到的挫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出的严重挑战。为此，他们既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认可马克思给予精辟论述的有关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概念；相信存在一种将优越于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和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将得到克服；又在三个方面以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一是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的基本方法论，其中包括功能解释法、理性选择法、逻辑分析法以及唯物辩证法。二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阶级观念、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新的分析和认识。三是规范劳动异化、社会异化、意识形态异化、人本身的异化以及经济剥削、阶级压迫、社会公正、民主制度等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和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经验派马克思主义不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则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文本，并形成一种突出辩证法和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力主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譬如黑格尔将积极能动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纳入到人类历史的选择和进步中，试图在抽象的、非物质的精神对象中寻找正确的知识和真理；认为真理作为一种先验的现实不是存在于被动状态的物质世界中，而是存在于始终处于积极状态下的客观精神或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不相信感性直观作用和反映功能，反映只能感知事物的现象，不能深入事物的实质，更难洞察或推断非事物的真相。客观精神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律，只有凭借精神的逻辑概念才能抵达被层层经验现象的迷雾所遮掩的真理的穹苍。真理不是一块宝玉，而是一种绝对理念或普遍力量，它作为相对真实知识的总和是独立于经验的主体性而存在的。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主体性认识支配和制约着世界的进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的目标就是尽最大可能使主体认

识和客观现实达到统一；使逻辑的必然性和真理显现的规律性具体化、客观化和现实化，使人们从理性的规律中获得肉体的自由和解放。如此等等，既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的形成，也影响了他整个一生。

他们认为站在黑格尔哲学的高度来看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至关重要。这不只是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带有鲜明的黑格尔色彩，就是其后，马克思的意图和战略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改造黑格尔，而不是像叔本华那样要全盘否定黑格尔。他在继承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同时，企图重新确立理念与具体世界的关系。为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实践纳入认识论，运用实践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重新拉回个别的主体中，使被黑格尔分离了的物质和精神、思想和行动、历史和现实重新统一。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反对一般的唯心论，倒是经常地批判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唯物论；以期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客观精神转化为生活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自觉领悟和行为表现；并断言必须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合理化，从而与人类文明的解放意识相一致。因而实践既反映了经济的生活世界，也反映了普遍真理，在两方面都证明实践的合理性与社会性。

马克思正是基于对社会实践的至上性认识，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系统地描述了使黑格尔主义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计划；指出，人类解放是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制约的，而且只有当后者是合理的时候，进步和自由的个体活动才可能在合理化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人们的解放运动才能够获得成功；主体性和客观性才能够实现统一；生活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公民才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反思，并自发地确立起公正的生活秩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提出“异化劳动”的观点。其精辟论述显然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异化”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他既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又肯定了黑格尔的哲学核心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因而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类是在历史中通过劳动辩证地完善自身，并最终达到类本质实现的。类本质是历史的普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理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尽管类本质只有在合理的条件 and 环境中才能够为人所认识,但是它却超越和规定着这些条件和现实。它是一个当历史的合理演变完成之后才得以具体化并为人们主观所认识的先验范畴。为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受其苦的群体才最容易激发起反思的、合理的思想和行动。所以只有处在社会最低层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才可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普遍真理,其所代表的人的本质才可能在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得以具体化和现实化。为此,他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还指出正是异化在商品拜物教中淹没了人的真实面目,铸成了市场的不公正,加重了剥削压迫,拉大了贫富差距。

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在 1846 年之后曾经详尽论述,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之下,人类将从主观上反思或设想主体与客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辩证关系,然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化了的非人的野蛮状态;指出历史的规律和必然总是朝着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而人类自由总是在有理智的行动者的革命实践中实现。历史在目前实现自由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的悲惨遭遇是进行正确思维和恰当的革命实践的动力。自由和必然在处于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工人阶级所认识和体验的根本真理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这一阶段复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主观成分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选择。片面地强调物质作用只会减弱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现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提供给全人类的物质财富正在与日俱增,而社会主义却没有能够如愿地完成这一全人类必须承担的最基础的任务。所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强调人的精神和主观认识的同时,一定要赢得工人的忠诚;在加强整个工业化的革命运动中,既要使非人化的工人获得解放和新生,又要使他们的认识主体在历史的客观辩证法中真正发挥作用。

在这个学派中,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应该仅仅赋予方法论意义,不应该看作是普遍真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改变现实中的唯一性质和功能就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经验主义或机会主义者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为此,他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概念。

而柯尔施则主要批判了经验唯物论者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力图扭转经验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仅仅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主义”倾向。他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考茨基的科学主义进行了详细对比,指出,马克思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复杂

的、非还原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其中也包括像宗教和哲学这样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它们不应该遭到轻视或被还原为对经济状况的现行反应。这种机械物理主义的还原不可能恢复作为能动的和革命的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消灭哲学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而是不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纯粹在理论上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以恢复被模仿者歪曲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也是完全必要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彻头彻尾的哲学，而且是革命的辩证的哲学。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哲学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就会使这种哲学受到致命的和无法补救的损失。可以说正是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辩证性的透彻分析，才使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像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高举马克思的革命哲学和辩证法的武器开辟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主张工人阶级应当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合作。在革命精英和革命群众之间应该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非极权关系。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要求一切组织和计划都不应该强加给无产阶级，而应该被广大民众合理地看作是创建社会主义的必要举措；要相信广大群众中隐藏着最大的智慧和能力。“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是社会分工把他们归为不同类群。知识分子与群众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使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精神生活，使整个社会都能够有效地在一个由理论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知识—道德集团”的控制之下。哲学上，他提出“实践一元论”，指出，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才弥合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绝不可孤立地考察物质，必须视之为社会、历史和生产实践作用的对象。现实中一切意义都从实践中来。只有社会集体实践才是唯一的现实。那些自在自为的物质世界表面上看存在于人类历史之外，实际上其客观性总是指人的客观性，它正好同“历史地主观的”相符合。“我们只能在同人类的关系中去认识实在；而既然人是历史的生成，那么，它也适用于认识、实在、客观性，等等。”^①

德国的 A. 施密特证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才真正是以社会实践为前提。正是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构。他说：“只有像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 pp.445-446.

马克思那样,承认物质实在一开头就被社会中介,才可能避免本体论和正确对待恩格斯的关于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关于物质只实在地出现在特定的存在方式中的公式。”^①自然界不是孤立自存的,其历史一直都打着人类社会的烙印。只有以人类认识史为前提,才谈得上自然和自然史。现实中的客体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思想客体”或“感性客体”,都是经过人类加工,剥去其“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人类认知的对象。在对象性归属人所干涉的领域时,它是一个已构成物;在不归属该领域时,则在思想上是预成物。因此列宁强调“物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的观点,不过是对意识和物质客体的抽象与割裂;没有说明实践对于客体的最终构成作用。特别是随着现代与日俱增地把自然纳入社会行动,客观性规定便日益增多地进入主体。“在现实历史中,物质和外部世界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要素,如要保持‘反映’这个成问题的观念,那就必须说实在反映人们的实践,像人们的意识反映实在一样的多。”^②

为此,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也主张,人类在日常实践中作用的自然界才真正构成人类实践的直接对象。人类通常所谓的真实世界都是通过具体思维对伪具体的扬弃,是从表象底下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认识真实的世界,在实践和思维方法上,与日常生活中直接显现在人类面前的现象世界的感性知觉不同。日常生活实践通常是一种功利性实践和经验性的、非辩证、非本质的思维。认识真实世界需要革命实践和辩证思维。只有辩证思维才能真正揭示出“事物、意义、关系被设定为社会的人的产物,而人则表现为社会世界的真正主体。”^③

继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之后,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认真汲取马克思有关反对抽象的哲学化的告诫和对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强调,指出: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会阻碍富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真理不是用抽象的思想体系来表达的,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客观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过程这一思想的全部意义”^④。作为真理载体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就是因为人们对这实在的关系从首要意义上讲,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实践、变革的东西,是由社会规定

① 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35页。

② 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224页。

③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④ 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页。

的。没有作为认识主体的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及其变化和发展，就不可能有自然与实体的真理认识。

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所有积极的思想体系的深刻批判，以至当欧洲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徘徊时，这些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痛苦地体验到：任何完美的哲学体系一经僵化成为把现实降低为绝对理论的教条主义的专政，就将失去其革命性和真理性，转化为虚假和非科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学说，其目的是通过戳穿各种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华丽辞藻来揭示日常生活中的剥削，降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否定和消除压抑人的价值和制度。这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官僚制社会主义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那里表现最激烈。他不仅以人本主义和否定论作为批判主义核心，由此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现象主义、科学主义、肯定主义以及反人道主义倾向；还批判了启蒙主义运动，认为启蒙只是自我毁灭，只是企图用知识代替幻想。他不仅批判了知识就是力量，认为知识和科学技术只是权力的工具，正是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通过知识和技术由人对自然的统治变成人对人的统治；还批判了大众文化，认为正是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广告化、标准化和模式化强迫人们接受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不仅批判了工具理性，尖锐地指出工具理性的危害就是导致理性毁灭；还对科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理论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现实中的无产阶级状况并不能为那些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任何正确认识的保证。无产阶级也会有无意义的经历，也会在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出现犯罪和不公正。打着科学招牌所贩卖的只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货色，其目的是要把人们都变成不能言论真理的哑巴，只让科学说话。

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一方面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等早期命题；另一方面则批判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和局限性，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解放人类，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使它一步步将人民普遍地变成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驯服工具，并导致虚假需求。在消除个人和公众差别的基础上，继续使个人成为压制整体的无理性的—部分。他认为在科学技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和人类不能批判地思考自己处于物质统治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通过资本主义和国

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运动而达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同个人自由是相矛盾的。这种通过异化劳动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导致的是不断加强的整合作用与公民顺从。它早已失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赖以为基础的个人的首创性；以无主体的职员理性或工具理性替代了企业家的精神，使得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每个人都缺乏拒绝强加的团体理性命令的精神适应能力。这就是工业社会必然形成的“极权主义”。它不是运用社会的政治经济镇压手段来剥夺人的自由和个性，而是通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固有的支配结构和管理技术来控制人和操纵人，使每个人都成为一种政治和感情上都消极的人；使具有创造潜力和能动性的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庞大机构面前处于无能为力的低靡状态；使得一个完全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社会凌驾于一切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之上。

这种社会控制就是阿多尔诺(Theodore Adorno, 1903—1969)所谓的“绝对一体化”。它只能够通过一种非异化或“非支配”的社会制度来摧毁。这种“极权主义”不是德国纳粹的政治恐怖，而是由人们所需求的“经济技术协作”造成的暗中为害的软恐怖。正是这种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协作否定了那具有积极属性的自由解放的可能性；使人民普遍相信既定的现实是一切可行社会中最好的社会。比如 20 世纪的哲学家波普尔就公开声称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社会，是所有先前社会发展的顶点，是最终的合理事物。这样，也就自然消除了人们对现存制度进行有组织反抗的基础。此时，人们已经满足于“不幸之中的安慰”，习惯于“心甘情愿的服从”，已经喜欢上虚假的需求、美丽的别墅、精美的汽车、潇洒的西服、丰富多彩的影视艺术以无可遏止的巨大魅力对他们的吸引或控制，使他们完全将本质的自由、非异化的劳动置之度外；忘记这些都是统治者的利益孵化的结果，不是出自人的自我决定。

真实的需求应该是那些从现存的制度中推动人性解放的需求，而且是通过批判和个人斗争达到的。因此“一切真实意义上的解放都有赖于人们对奴役状态的觉醒”；有赖于摆脱这种“把本质的人格当作商品”的认识；抛弃那种把“小汽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的家庭住宅以及高档的厨房设备当作人生灵魂”的追求，代之以新的需求、新的价值和新的人生，真正地将爱欲和文明结合起来，追求那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和愉快的、爱欲化的休闲。要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仍然是压抑人性的国家”。欲实现真正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去改造人的

需求和人的敏感性，使个人不再依赖于“一种在满足他的需求时将使他永远处于受奴役状态的剥削机构”^①。消除意识和劳动的异化，将劳动与消遣融为一体，将新敏感性和新理性相互结合，将理智和性欲，即心灵的理性和肉欲的理性相互统一，将心灵的理性需求变成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使得“无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变成那些为这种社会而斗争的人们的基本要求”^②。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批判理论基础上，结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建立了心理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两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就是：都以批判、怀疑的精神进行思考；都相信“真理会使人类获得自由”。只是马克思认为真理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武器；弗洛伊德认为真理是引起个人变革的武器；“正是理性和真理使精神分析法在一切治疗方法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③。他们都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只是马克思继承伏尔泰和歌德的人道主义传统，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无意识概念中。

此外，弗洛姆还从心理学和伦理学角度规范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心理学既不能与哲学和伦理学分离，也不能与社会学和经济学分离。弗洛伊德主义者们试图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这是错误地割裂了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关系。而他则是要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建立一门完整的研究人的存在和人类本性的科学，并由此提出他的“人格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危机，或现代文明的根本病源就在于人的基本人格被“占有欲”征服，而要治疗这种病症，就需要确立“存在”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正处在一个幻想破灭的时刻。人类曾经幻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就会到来，那时“征服自然、物质丰富、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及无限的个人自由”就会实现，而今天这种预言已经无法兑现。随着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不过是巨大无比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飞轮，我们的那苛求独立自主的梦想也就化为泡影。科学技术的进步既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带来了核战争，两者的总和可能给每一种文明，甚至每个人都带来末日。

① H.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1969, p.13.

② H.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p.90.

③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